

思想树上的果实

范国强 著



思想树上的果实

范国强 著

二〇〇二年六月

[2002]鄂石图内字第 018 号

印 刷：黄石市精美图印公司

工本费：12.60 元

第一辑

- 第三次大的思想解放的起点/7
- 明确理论的三大作用/11
- 论不同层次党员的教育之一：
关于党员的年龄特征与教育/15
- 论不同层次党员的教育之二：
关于党员的文化素质与教育/28
- 论不同层次党员的教育之三：
关于党员的职业需要与教育/38
- 重视抓好三个层面的思想教育/54
- 我党从何时开始举起邓小平理论的这面旗帜
——兼与周大仁教授商榷/58
- 深入学习领会我党三代领导核心
关于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思想/65
- 党员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利益观/77
- 新形势下加强基层党员管理工作刍议/87
- 浅论领导干部的“为人民服务观”/95
- 试析为人民服务的三个层次/98
- “为人民服务”四题/102

第二辑

- 浅析“腐败不可避免论”的荒谬与危害/111
- “执纪不严”诸因素浅析/117
- 加强党的纪律是保持稳定的重要条件/121
- 反腐防变如何坚持走群众路线/127
- 对当前行业不正之风的观察与思考/134
- 国有资产流失中腐败现象及对策初探/140
- 浅谈企业中的腐败现象、原因与治法/147
- “腐败”概念不应泛化/154
- 专项治理机制运行的十个特征/157
- 党纪建设进程中的一座里程碑
——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163
- 24、廉政谈话“十注意”/167
- “可亲、可信、可敬”
——纪律检查干部应追求的三种境界/171

第三辑

- 精神文明建设要“求深求实求精”/179
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建立保障体系/184
研究要“够”/189
形成领导权威诸因素之我见/193
述职“六病”/197
“办事”与“用人”
——浅谈企业的部门领导干部素养/202
浅谈“管党”、“治党”和“用党”/207
发展党员“八忌”/212
某些领导干部不愿亲自写文章的心理障碍/217
文明小区标准刍议/223
成功讲演诸因素探析/226
现代人有哪些恐惧感/231
黄石呼唤文化街/237
抓好“两点一线”实施“杠铃工程”/242
一篇振聋发聩的调查报告
——《管改结合：东钢绝处逢生的成功之道》读后感/247
党的干部要有人民的心
——读《你是一座桥》/251

自序

这十多年来，我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结合自身工作的需要，拉拉杂杂地写过一些论文，散见于国内的一些报刊杂志上。一个偶然的因素，使我突然动了把这些论文收编成集的念头。这偶然因素起自于一位多年未见的朋友在一次邂逅时对我说的话，他说从报刊上看到你写的论文，感到很有些嚼头，有些对工作既有指导性又有可操作性，也有一定的文采。陡然听到他的这番话，真令我有受宠若惊的感觉。说老实话，自己的论文能受到别人关注，这就很不容易；能受到别人称赞，这就更为难得。当然也可能是他的过誉之辞，但这位朋友向来以清高著称，他没有对我讨好的理由。正是他的这番话的鼓励，又恰逢党的八十一周年诞辰即将到来和党的十六大即将召开之际，这便促使我开始认真地清点自己的思想树，虔诚地将自己认为较为成熟的果实一个个摘到盘子里，作为献给党的一份礼物。

坦率地说，我不是理论家，也从未做过理论家的梦。我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基层党务工作者。我其之所以学着写了一些论文，多半都是因工作需要，有些是约稿在先，有些是有感而发，按鲁迅先生的说法它们“并不是涌出而是挤出来的”。我多年来从事党务工作，自有许多份

内的事情要做。当然写论文也可以说是我的“份内之事”题中应有之义，但不写或少写论文谁也不会来追究我是失职。论文写得多了，这多少有点“不务正业”的味道。某些人正是这样讥嘲我们这些人的。但我可以无愧地说，我从不占用正常工作时间写论文，我只不过是利用了别人都拥有的公休假日和深更半夜的时间来致力于此。在写作时，也未认真思忖过写出来后是否可以称之为论文。记得《论不同层次党员的教育》这篇长达两万六千多字的论文（收录本书时分为三篇），当时就是应市委组织部年轻的科长江金权（此君现在中央政研室工作）的特邀而撰写的，他当时正在组织一班人撰写《党员教育学概论》这本书。写成后他认为我这一章写得还不错，几乎是未作修改便全录入书，这本书后来听说曾受到中组部的表扬。我开始学着写论文时可以说是不重文体只求达意，只不过后来以论文形式发表了，有的还得奖了，我方知道论文也并非可望不可及之物，“草头班”出身的人大可不必望而生畏。这大概是我多年来学着写论文最重要的感受之一。

毫无疑问，写论文是要有思想的。没有思想的论文就等于论文没有灵魂。论文二字，据我直观理解一要有“论”，这“论”即是指抽象思维，是指要有自己的观点，不能人云亦云；二要有“文”，这“文”即是指形象思维，是指要有那么一点文采，不致味同嚼蜡。由于我自身工作的性质，我所写的论文都属社会科学的范畴，都是仅就我工作范围内的一些探索和思考。诚然，社会科学不比自然科

学，料想撰写自然科学方面的论文要复杂艰难得多，譬如陈景润的攻克《哥德巴赫猜想》，那无疑是数学皇冠上的明珠。但这并不等于说撰写社会科学方面的论文就没有一点难度，有人错误地认为写社会科学论文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以我的体会，写社会科学方面的论文其实也是一件十分劳心的事情。我不敢说我所写的每一篇论文都是呕心沥血之作，但我敢说我为每一篇论文的态度都无疑是认真的，是尽心尽力的。尤其是每当我写完一篇自认为还比较满意的论文后，都仿佛有一种大病初愈一身轻快的感觉。论文辛苦事，得失寸心知，相信不少人都会有类似的同感。

几年前，我曾在湖北省委党校学习过三个月，当时的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现在的省委副书记邓道坤给我们讲课时说的一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领导干部要学会用写文章来开展工作”。言外之意，写文章应当是一个合格的领导干部的基本功。这“写文章”我以为当然主要是指“写论文”（当然也包括自己亲自写讲话稿和报告稿）。要“写文章”就不能没有自己的思想，而但凡有自己的思想的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就无疑会有自己的思路。不能设想一个思路不清、一切必须靠秘书作“拐杖”的领导干部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领导干部。多年来，我正是以此自励，在工作中力图干出特色，在生活中永远保持本色，这也是我今后当一如既往不断努力的目标。

这是我自己出版的第四本书，能够赶在党的生日来

临之前和党的十六大即将召开之际出版,我甚感欣慰。倘若能对同行有所旁鉴,我将引为满足。东拉西扯说了以上一些话,是为序。

作 者

二〇〇二年六月二十日于黄石青山湖畔

第一辑

第三次大的思想解放的起点

有人曾经撰文说：中国在本世纪里共出现过三次大的思想解放，第一次是五四运动，使中国人从儒学的古教条束缚中解放了出来，从黑暗的地下攀升到光亮的地面；第二次是延安整风，使我们党从洋教条束缚中解放了出来，从遥远的他乡回到了自己的故乡；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以来，主旨是让全党和全国人民从左教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是要让社会主义由虚无缥缈的天空回到坚实可靠的大地。我认为，二十年前的那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无疑开启了新形势下解放思想的闸门，成为这第三次大的思想解放的起点。

解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最基本的原则，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然而若没有当年那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要认识到这一点并在实践中不断解放思想可以说难乎其难。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当年那场真理标准讨论的重大意义和历史价值，怎样估价也不过份。

真理标准讨论的重大收获之一，是使中国人民在摆脱左的羁绊中解放了思想。粉碎“四人帮”以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新老个人迷信交织在一起，“两个凡是”牢牢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严重阻碍了拨乱反正的进程。通过重新

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人民在长时期中形成的左的思维定势发生了改变，群体反思的直接效果是敢于对“两个凡是”说“不”，敢于对“文化大革命”说“不”，从而为我党彻底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奠定了坚实的群众思想基础，为召开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好了充分的理论准备。随着真理标准问题的明晰，全党全国人民从“两个凡是”的禁锢中解放了出来，在精神上取得了主动权。一大批冤假错案相继平反，一大批遭诬陷被打倒的老干部得到了重新解放，全党全国达到了空前团结。这是很重要的“转弯子”，也是必不可少的“换脑筋”。没有这“转弯子”和“换脑筋”的过渡，就不可能使中国这只在左的航道上错误地行驶已久的大船平稳地转舵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也就不可能在中国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真理标准讨论的重大收获之二，是使中国人民在探索新的道路中解放了思想。八十年代末，世界形势发生了不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急剧变化，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分崩离析，苏联共产党宣布解散并直接导致国家解体，国际共运转入低潮。其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是这些国家未把本国的事情办好，因循苏联模式走入了死胡同。而中国人民早在十年前通过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更加坚定了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在实践中坚持走自己的路的决心，并进行了艰难而又大胆的探索，探索的表现形式就是在全国旗帜鲜明

地坚持改革开放。当出现上述局面，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中国人民更加强烈意识到，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惟有坚定地搞改革开放，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才能使社会主义事业永葆青春。围绕着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认真总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我国建国以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中国人民进一步解放了思想，进一步加快了改革开放步伐。可以说，这二十年来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得益于这次真理标准的讨论。没有改革开放中一浪高一浪的思想解放浪潮，中国这只大船就难免搁浅，就不可能在“沉舟侧畔”乘风破浪奋勇前进。

真理标准讨论的重大收获之三，是使中国人民在开辟新的航程上解放了思想。这场讨论最大的历史价值是使我们党在新时期树立起了邓小平理论这面伟大旗帜，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也正是这场真理标准讨论后所结的硕果。历史经验证明，一个没有理论指导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而一个正确的理论却必须经过反复的社会实践和岁月的大浪淘沙才能够形成。在世纪之交的时刻，我们有邓小平理论作为新时期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我们民族的幸运。真理标准讨论使中国人民在政治上和理论上更加趋于成熟，更加懂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始终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任何时候都必须注重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有机结合。中国人民再不会陷入失去伟人后的

困惑和彷徨。伟人虽去，但斯言永存：“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邓小平语)。”中国人民也将不会再囿于形形色色的思想禁锢，而是将着眼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崭新实践不断去发展创新，从而不断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

(原载《黄石社会科学》1998年第二期)

明确理论的三大作用

列宁曾经指出：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革命政党，就不会“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是从总体上高度地概括了理论的重要作用，具体来讲，理论的作用我以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咬定青山不放松”——“固本”作用。“固本”主要是指理论能使人们真正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深刻认识共产主义的价值目标，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正确的理想信念是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身、立业、立国的精神支柱，没有理论支撑，这精神支柱就会偏移，甚至坍塌。在战争年代，革命先烈夏明翰、方志敏在敌人的屠刀下慷慨高吟“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是理论的力量使他们寻求到了真理并甘愿为了真理而献身；在和平时期，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学习了《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四卷以后，感受最深的是，懂得了怎样做人，为谁活着……”。是理论的力量使雷锋树立起了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甘愿为党和人民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邓小平早年在德国勤工俭学时就开始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九二六年离德赴苏去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